

# 美国动态

(半月刊)

2019年11月1日 (第202期)

内部交流 仅供参考 请勿引用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 卡内基专家：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取得了长足进步

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若美国希望中国取得更大进展，应该与中方合作而非实施惩罚性措施。

# 中美关系

## 美学者称美中贸易冲突的重要性被高估

美国企业研究所网站 10 月 11 日登载该智库专家史剑道 (Derek Scissors) 的文章称, 美中贸易冲突的重要性被高估了, 事实上, 而两国做出的国内经济选择更具破坏性。

文章称, 对中国而言, 出口大幅下降会损害中国的财富和 GDP 增长, 但这只是暂时的。一旦对美出口降至新低, 增长效应就会结束。这对中国整体经济规模的影响非常小。与出口缩减相比, 中国某些国内政策更需要关注。中国的金融系统扭曲, 充足的融资并未改善经济。中国庞大的国有部门利润丰厚, 但代价巨大, 因为它们可免于市场竞争, 这不可避免地限制了创新。最后, 中国农村收入水平低, 这是中国面临的一项长期挑战。

关于贸易战对美国带来的成本, 美国有很多预测, 但所有预测都不足美国消费的 1%。贸易冲突对增长的影响也很小, 而且是暂时的。贸易冲突的主要影响可能是美国股市, 但 20% 的跌幅很容易消化。此外, 高涨的美国股市加剧了财富不平等, 这一社会问题的重要性远高于贸易冲突。美国的另一大错误是财政上的不负责任。2019 年, 美国联邦预算赤字将达到 GDP 的 5%, 超过 1 万亿美元。这与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关系。

当然, 美中争端可能会加剧。但提高中国金融中介或减少美国借贷更为重要。对于大型经济体而言, 国内因素才是关键。

## 美刊: 美中敌对情绪的产生不能只归咎于特朗普

美国《政客》杂志 10 月 15 日刊文称, 特朗普发动的中美贸

易战使两国关系跌至谷底，然而两国问题的根源在于美国政界和社会中广泛存在反华情绪，这样的现状十分危险。文章摘要如下：

事实是，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敌意不能完全归咎于特朗普，这种敌意深植于美国社会。特朗普对中国采取的政策只是代表了美国国内的一种共识：中国的价值观念和利益与美国是对立的，必须对中国采取强硬的手段。然而，这种自反性共识的问题在于，它不仅完全忽视了美中经济联系的深度，也无视了中国解决国内混乱和暴力现象、改善人民生活质量取得的巨大进步。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美国社会广泛的对华强硬态度似乎导致了糟糕的政策。对抗性和惩罚性的策略足以破坏美中关系，但不足以迫使中国做出系统性改变。如今美国不仅夸大了中国威胁，而且没有准备好应对威胁。值得庆幸的是，与苏联不同，中国目前在全球范围内的野心并不大，中国对资源丰富的地区进行投资，主要目标是经济而非领土扩张。

放眼美国政界，几乎没有人对“中国威胁论”提出有意义的质疑，或在考虑中国的发展前景和美国当前的实力之后再提供务实建议。除非美国开始更理性、更现实地对待中国，否则美国未来几年将为之付出代价。

### **美学者：特朗普是中国的最好帮手**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 10 月 15 日登载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主任韩磊 (Paul Haenle) 等人的文章称，特朗普自诩为美国历史上首位愿意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的总统，然而对中国而言，特朗普的弱点比他的“咆哮”更重要。

在中国政府官员和学者中，越来越多的人希望特朗普连任，因为尽管特朗普咆哮着反华，但他给了中国在亚洲扩大影响力的

空间，且更重要的是，全面削弱了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从零和的立场出发，一些中国人认为，从长远看，特朗普的政策在战略上对中国非常有利。

虽然特朗普政府给对台军售亮“绿灯”，但如果中国大陆武力打击台湾，特朗普是否会支持后者仍是未知数；特朗普政府基本上放弃向世界贸易组织提起申诉，并阻止了世贸组织上诉机构的任命；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而中国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进入最后阶段；美国放弃在多边机构中的领导地位，为中国在全球治理和国际规则制定中发挥更大作用提供了空间；前几任美国总统都认识到与伙伴合作的重要性，而特朗普采取让盟友怀疑能否指望美国；至于贸易战争，被大肆宣传的“迷你协议”并未迫使中国实施结构性经济改革，无助于减少中国补贴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特朗普破坏了美国在国内的政治优势，损害了美国在海外的声誉和信誉，颠覆了迄今为止在亚太地区稳固的联盟结构，削弱了美国的影响力。他给予中国机会去获得关键的地缘政治优势，并创造一个更有利的国际环境来推进自己的利益。

### 彭斯涉华演讲的五个关键点

《外交政策》期刊网站 10 月 24 日载文称，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发表的涉华演讲有五大关键点，摘要如下：

第一，将香港问题与贸易谈判挂钩。彭斯表达了对香港抗议活动的支持，这说明特朗普政府可能希望香港的抗议会促使中国达成一项协议，并加大中国在香港实施“镇压”的风险。

第二，中国在文化战争中立场更加强硬。中国迫使一些美国公司采取中国偏好的思维方式，彭斯将这种冲突作为美国文化战

争中有关言论自由和政治正确的武器。由于美国公司日益表现出与特朗普政府相左的自由立场，并同时希望在中国市场“分一杯羹”，美国保守派开始批评这些公司与北京接触的方式。

第三，解决有关“脱钩”的争论。中国官员认为，贸易战不是为了寻求推动中国经济政策进行边际改革，而是意在使中美“脱钩”，并孤立中国。彭斯在演讲中对此予以否定，称美国寻求“与中国合作，但必须符合公平、互相尊重和国际商业规则”。

第四，强调有关知识产权“窃取”的争论。彭斯表示，中国虽然在贸易谈判中做出过相关承诺，但仍未停止“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使美国企业蒙受重大损失。

第五，政治干预。彭斯在演讲中并未直接提及北京“干预”美国政治，而是称“北京的经济和战略行动，及其试图塑造美国公众舆论的行为，证明了我一年前说过的话，今天也是一样：中国想要一个不同的美国总统”。

### **卡内基专家：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取得了长足进步**

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若美国希望中国取得更大进展，应该与中方合作而非实施惩罚性措施。

《外交政策》期刊网站近期登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亚洲项目高级研究员黄育川等人的文章指出，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文章摘要如下：

美中两国若要在贸易方面达成任何重大交易，都需要在一个关键的结构性问题取得进展：知识产权。然而，历史告诉人们要谨慎，且华盛顿的要求是不现实的。各国只有在本国的创新能力取代了对外部知识的依赖之后，才能够制定强有力的知识产权

制度。一个世纪以来，美国自身在知识产权方面的发展就是例子。

人们很容易把“获得(acquisition)”当作偷窃的委婉说法而对此感到不屑。但在现实中，贸易、外国投资、授权、国际研究合作、专家跨境流动、收集公开材料、模仿、逆向工程，都对中国的技术进步做出了贡献。这些活动大多是合法和自愿的，且显然有利于美国的商业利益。

然而，观察人士往往只盯住非法和有问题的方式。譬如，除了被控窃取知识产权外，中国还被指责要求外国投资者与中国企业组建合资企业并转让技术。而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一项最新调查中，只有 5% 的受访者表示曾被要求向中国转让技术，在“外国公司面临的 27 大挑战”中，这种担忧排在第 24 位。

此外，所谓的“违规行为”并不是只有中国有。从历史上看，当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向更高的收入水平过渡时，往往会被“抓住”。例如，日本、韩国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几十年前都是“301 条款”的“长期违规者”如今，中国因其规模和自上而下的国家主导模式而受到特别关注。

美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始于 1790 年出台的第一部专利法，但该法未对任何外国成果提供明确保护。在工业化初期，美国是侵犯知识产权的“全球领导者”，这一事实在当前的讨论中经常被忽视。商人弗朗西斯·卡伯特·洛厄尔(Francis Cabot Lowell)通过模仿和改造英国的动力织机，帮助美国开启了工业革命。直到 1891 年，美国知识产权法走过了整整一个世纪之后，“蔡司法案”的通过才终于将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扩大到外国人。

相较于美国，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在短短几十年就取得了巨大进步。美国公司也已经注意到中国的变化：中国美国商会的一项调查显示，2018 年，96% 的受访者表示过去五年中国的知识产权执法有所改善或保持不变，而在 2014 年这一比例为 86%。

尽管中国切实取得了巨大进展，但美国继续向中国施压，要求其进一步改善知识产权保护。美国还希望用征收关税的方式来惩罚违规行为，而中国不得采取报复措施。然而，历史教训表明，惩罚性措施是错误的，一个更具建设性的方法是双管齐下。

首先，持续改善立法和实施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并承认这一过程的长期性。美国可通过多边渠道施加有意义的影响，呼吁盟国要求互惠，推动加强国际仲裁法庭的作用。此外，外部压力可发挥重要作用，但中国的内部激励最终将发挥更大作用。

其次，美国应该致力于与中国合作，促进开放创新，设计双方都认为是公平和互利的知识转让体系。试图减缓中国创新发展只会削弱其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动力。如果西方国家希望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做得更好，就需要与中国合作，帮助其成为一个更具创新性的国家。

## 美国外交

### 液化天然气对美国印太战略的影响

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网站 10 月 17 日登载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尼科斯·塔夫斯 (Nikos Tsafos) 的文章称，特朗普政府将液化天然气 (LNG) 置于美国印太战略的中心。文章探讨了该战略决策的根源、目标和限制。

美国逐渐成为 LNG 的主要供应国，而印太地区正成为 LNG 的主要市场，因此将二者相结合具有潜在的商业逻辑。特朗普政府希望利用这种互利关系来推进其在印太地区更广泛的战略。但过于依赖 LNG 来推进政策目标的战略存在风险。

首先，由于 LNG 贸易是由商业因素驱动的，因此美国政府对

投资和其他决策所施加的影响是十分有限的；其次，LNG 这一杠杆通常太小，不足以影响广泛且复杂的双边关系；最后，过度将一种商品政治化可能会损害美国的战略利益，因为此举会降低对市场的信心，并导致各国采取措施减少对 LNG 的依赖，特别是对美国 LNG 的依赖。

因此，美国应从长远的角度看待天然气和 LNG，至少要避免将 LNG 政治化，或将 LNG 与其他双边和多边争端交织在一起。更重要的是，美国需要以一种战略视角来培育市场，建立制度、规则和工具，这样才能确保 LNG 在能源转型中占据突出地位。

### **麦康奈尔：从叙利亚撤军是一个重大错误**

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 (Mitch McConnell) 10 月 18 日在《华盛顿邮报》撰文称，特朗普政府宣布从叙利亚撤军是一个重大错误，将重蹈奥巴马政府从伊拉克撤军的覆辙。

麦康奈尔称，从美国对抗激进伊斯兰恐怖分子的历史中可得出三个教训：第一，恐怖主义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一旦恐怖分子重新集结并开辟避难所，“恐怖”将蔓延至美国本土；第二，美国的领导地位不可替代，美国带头的多边行动不仅对抗了恐怖主义，更代表了以美国为主导的二战后国际体系，一旦美国让位，必将建立不利于美国的新世界秩序；第三，美国不是孤军奋战，还有当地势力的重要支持。

美国的撤军以及土耳其人与叙利亚库尔德人之间的矛盾升级，这两件事加起来对美国而言是一场战略噩梦：美国打击恐怖主义的步伐受挫；阿萨德政权及其支持者伊朗会乘机扩大影响力；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地位会因此上升。美国应该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在尊重土耳其合法安全关切的同时，让土耳其

重新与美国站在一条战线上。通过限制土耳其入侵，鼓励其停火；重新引入美国军队，让土耳其远离俄罗斯，回到北约的怀抱。

为了向“伊斯兰国”恐怖分子施压，遏制伊朗的侵略，帮助当地合作伙伴，美国应该在叙利亚及其他区域保持有限的军事力量，与盟友密切合作，并且不能从阿富汗提前撤军。一旦放弃赢得战争的机会，那么战争就会无休无止。

### **美学者：特朗普应重新考虑美国对韩国的承诺**

《国家利益》期刊 10 月 27 日登载卡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道格·班多（Doug Bandow）的文章称，虽然韩国和日本抱怨朝鲜针对他们，但特朗普强调美国安全的做法是对的。文章摘要如下：

虽然朝鲜被视为对美国的威胁，但客观而言，朝鲜对华盛顿并没有太大影响。朝鲜是一个遥远、贫穷的小国，不足以对美国造成威胁。即使朝鲜继续进行核试验，它也不会发动核战争，因为这意味着朝鲜政权的覆灭。66 年前，美国帮助韩国是有道理的，但今天，美国可以自由决定是否充当韩国的保证人。

美国的重心应放在防卫本国。虽然日本和韩国领导人对朝鲜最新试射导弹的行为表示担忧，但美国的政策不应由盟友的不安来决定，其他国家应对自身的安全负主要责任。东亚地区的力量平衡早已改变，目前韩国的经济规模是朝鲜的 54 倍，不必担心朝鲜吞并韩国。

若朝鲜获得摧毁美国城市的能力，朝鲜半岛上的常规冲突可能会演变成核威胁或核战争。美国与韩国的联盟并不值得美国冒如此大的风险。朝鲜半岛不大可能实现全面的无核化，但这并不能阻止美国从韩国进行常规撤军，继而进行全面撤军，以诱导朝鲜放弃核武器。美国的存在应该是保卫美国而非终结美国的手段，

美国应结束任何危及美国利益的部署。

### 特朗普宣布巴格达迪之死有何看点？

大西洋理事会网站近日该智库中东项目主任、前美国助理国防部长威廉·韦克斯勒（William F. Wechsler）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除掉了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头目巴格达迪，这既让人欢欣鼓舞，也带来了反思的机会。从特朗普的声明中能得出五个初步结论。

第一，尽管华盛顿一片混乱，但美国政府中仍有人在继续认真工作。此类行动是在美国军方和情报机构成千上万人的支持下，数百名专业人员多年努力的结果。而美国特种作战部队愿意将自身置于极大的风险之中，以保护无辜平民，这些军人和文职专家应该受到尊重。

第二，“伊斯兰国”受到严重打击，但并不是致命打击，针对萨拉菲圣战组织的斗争远未结束。只要逊尼派的不满情绪依然存在，这场萨拉菲圣战主义运动就会继续，每隔十年左右就会产生一个新的恐怖组织。

第三，美国仍然不可或缺。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有 81 个成员，但并不是所有成员都会派兵上战场。目前许多人认为，美国正处于从中东撤退的早期阶段。如果这种看法最终成为现实，那么萨拉菲圣战恐怖组织将是最大的受益者。

第四，政策制定者必须确保行动安全。在恐怖组织头目被除掉的时候，相关信息泄露的风险可能会增加，这或许有助于未来的恐怖分子避免“重蹈巴格达迪的覆辙”。但很不幸，特朗普总统在新闻发布会上披露了如此多的行动细节。政策制定者应避免在摄像机前假装自己是行动者。

第五，避免把反恐政治化。多年来，美国的反恐工作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但并非完全)免于政治化。反恐取得的成功，从根本上说是所有美国人的胜利，而不仅仅是总统支持者的胜利。

### **美智库：美国应调整与印度的战略伙伴关系**

新美国安全中心网站近期载文称，美国和印度的战略伙伴关系对于应对“修正主义的”中国带来的挑战至关重要，但美国必须调整其政策方针，以确保美印伙伴关系更专注于战略目标，并能更灵活地应对干扰。

近 20 年来，华盛顿一直抱有这样一个战略逻辑，即美国应该帮助印度崛起为一个大国，因为更强大的印度是制衡中国实力和雄心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

美国与印度加强战略伙伴关系的政策，建立在两个假设之上：一是印度拥有必要的资金迅速崛起为亚洲强国，并缩小与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差距；二是随着美印克服历史上的不信任感，并在越来越多的地区安全问题上达成一致，两国政策将继续趋同。

但这两个假设已被证明是不可信的。首先，印度并没有缩小与中国的差距。印度的经济改革松散零碎，国家实力仍然较弱；军事现代化缺乏资源，需要进一步进行机构改革。其次，美印政策趋同方面存在巨大限制。印度与俄罗斯保持着国防采购关系，这可能会限制美国向印度转让敏感的国防技术。在整个地区，印度维持着一个复杂的富有成效的关系网络，在伊朗等一系列问题上采取了与美国偏好不一致的政策立场。

考虑到应对中国挑战的紧迫性，美国需要重塑与印度的战略伙伴关系，把重点放在一系列可实现的优先目标上。美印战略伙伴关系对地区力量平衡的最大贡献是，在印度洋地区采取拒止战

略。该战略的政策目标是，使中国无法胁迫地区国家、建立更大规模的永久驻军或威胁印度和其他国家的行动自由。

美国和印度的战略伙伴关系将侧重于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向区域国家提供协调的安全援助。美国在提供安全援助方面，有大量专业知识和丰富的经验，而印度在印度洋开展了一系列安全援助活动。协调两国的单边行动，将有助于美国和印度更高效地实现有效安全成果，确保各自的活动符合更广泛的战略目标，并与地区军队建立信任。

其次，印度军事人员与地区国家开展相互交流。加入伙伴国军事组织的人员有助于建立互信。印度军方训练有素的军官也可为较小的地区国家提供重要的专业知识和能力。

最后，与能力更强的军队开展多边演习。美印应增加军事演习的频率和复杂性，但考虑到该地区的规模，以及未来可能面临的军事挑战，两国应该扩大某些军事演习的范围，把澳大利亚、日本和法国等其他能力很强的军队包括进来。

这种重新调整的战略关系的优势是，可以利用印度现有的地理和历史优势，专注于某一高度优先的政策目标。最重要的是，它将为美印战略伙伴关系提供一个框架。在该框架中，美印战略伙伴关系不再依赖于对印度迅速缩小与中国差距的高期望，也不依赖于两国在广泛的安全问题上继续保持双边政策趋同。同时，该框架还能使双方集中精力应对地区力量平衡面临的紧迫挑战。

## 美国政治/其他

### 特朗普是否兑现了重振美国制造业的承诺？

美国福布斯网站 10 月 23 日载文称，重振制造业的承诺是特

朗普竞选总统时的重要口号之一，然而经济疲软正在蔓延，贸易政策和政治不确定性正在限制更强劲的增长势头。

总体上，2017 年和 2018 年对美国制造业是有利的。特朗普推翻了奥巴马政府的许多政策和规则，采取一系列有助于提振信心和刺激新投资的措施。数据显示，特朗普上任以来，制造业总就业人数增加了近 50 万；以实际美元计算，制造业总产出在 2019 年年中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产能利用率回到了战后的正常水平；自 2017 年 1 月以来商品出口增长了约 15%；资本投资从 2016 年的低迷中复苏，实现了稳健增长。

然而，从 2019 年年中左右开始，制造业的增速明显放缓。美国供应链管理协会的调查结果显示，今年 8 月和 9 月的制造业数据降至自“大衰退”以来的最低值。占据美国 GDP30%的制造业一旦松了劲，可能会给美国的整体经济带来不利影响。

这种疲软背后，也许只是一些短期事件起了作用，但同时信心指数也在衰退，抑制资本投资。其中，贸易政策的不稳定和美国政府的内部分歧是原因之一。一些政治立场摇摆不定但却至关重要的州出现了制造业就业负增长，这对特朗普来说是不祥之兆。特朗普与中国和日本达成的贸易协议主要是对农业起到积极影响，不过达成协议的确缓解了局势紧张，可能也是提高知识产权保护、促进数字贸易的开端，而这些对制造业至关重要。

2020 年即将到来，影响制造业的政治环境出现积极变化的前景并不乐观：美国众议院不太可能起到积极作用；与中国的下一轮谈判困难重重；欧洲盟友讨厌特朗普，又面临内忧。

## 2020 年大选将影响美国未来的经济

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 10 月 23 日登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

迈克尔·博斯金 (Michael Boskin) 的文章称, 美国经济表现将在明年的大选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文章摘要如下:

如果美国经济继续保持强劲, 特朗普成功连任的几率非常大; 若经济下滑, 或民主党选民投票率高, 而共和党投票率低, 特朗普则可能输掉大选。若特朗普成功连任, 不可能期望他追求传统的、保守的经济政策, 从特朗普及其顾问的暗示来看, 他可能会推行新一轮的监管和税收改革。

民主党候选人支持从医保开始逐步扩大社会安全网。一些候选人希望在“平价医保法案”的基础上发展, 另一些候选人则希望取消私人医保。沃伦和桑德斯等民主党人计划推行政府单一付款人制度, 考虑到此举的巨大成本, 这意味着所得税将大幅提高, 或实行欧洲式的累退式增值税。这两项举措都将加大中产阶级的负担, 并削弱经济激励措施。

特朗普和民主党人都希望加大基础设施投入, 但都未提出可行的计划。在政府监管方面, 特朗普将取消奥巴马时期的过度监管作为重点; 但沃伦等民主党候选人则希望加强对科技巨头的监管和反垄断执法, 并可能收紧金融监管, 或彻底改革公司法。

在贸易方面, 特朗普将重点放在他认为“不公平”的动态上。但与中国的贸易战拖累了商业投资, 并破坏了其税收和监管改革带来的积极影响。虽然民主党人经常批评特朗普有关贸易的做法, 但他们并没有提出进一步的贸易自由化。

美联储下一任主席人选也至关重要。特朗普多次批评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认为其推行的货币宽松力度过小, 因此他可能倾向任命一位鸽派候选人。左倾的民主党人可能会做同样的选择, 中左派可能会支持鲍威尔连任, 或者选择温和的民主党经济专家。

## 美元武器化可能适得其反

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 10 月 23 日登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杰弗里·弗兰克尔 (Jeffrey Frankel) 的文章称, 将美元武器化, 可能会适得其反。文章摘要如下:

相对于其他竞争性货币, 美元仍遥遥领先。目前 47% 的全球支付使用美元, 31% 的全球支付使用欧元。88% 的外汇交易涉及美元, 几乎是欧元份额 (32%) 的三倍之多。各国央行的外汇储备中有 62% 是美元, 而欧元仅占 20%。就其他贸易和金融中的货币使用指标而言, 美元也占据主导地位。

2013 年, 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承诺不为汇率设定目标, 包括各国官员不“口头干预”汇率, 也不刻意追求货币刺激来使货币贬值。但特朗普曾多次“口头干预”使美元走低, 并向美联储施压要求其降息, 以使美元贬值。这都违反了惯例。

美元的“武器化”通常是指美国政府利用美元的全球主导地位, 扩大美国法律 and 政策的治外法权。最突出的例子是特朗普政府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 将其排除在国际银行体系, 特别是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 (SWIFT) 之外。面对美国的制裁, 俄罗斯在 2018 年大量抛售美元储备, 以非美元货币出售石油。同样, 欧洲和中国可能会成功开发出替代性支付机制, 允许伊朗出售部分石油。从长远来看, 这些都可能会削弱美元的作用。

## 皮尤调查显示, 美国信教人群数量正在下降

皮尤研究中心网站近日载文称, 美国的宗教版图正在发生变化, 无宗教信仰的人数增多, 美国人参加宗教活动的频率也在下降。文章摘要如下:

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显示，基督徒的数量以及基督徒在美国成年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都在下降。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2009 年美国约有 2.33 亿成年人。皮尤研究中心当时进行的随机拨号调查显示，77% 的美国成年人是基督徒。也就是说，2009 年美国大约有 1.78 亿成年人是基督徒。截至 2019 年 7 月 1 日，美国成年人数量约为 2.56 亿。据皮尤 2018 年和 2019 年的调查估计，约 65% 的成年人称自己是基督徒，这意味着现在美国大约有 1.67 亿成年基督徒。

新教和天主教教徒的数量都在减少。目前，43% 的美国成年人信仰新教，低于 2009 年的 51%。20% 的成年人信仰天主教，低于 2009 年的 23%。天主教徒不再占美国西班牙语裔人口的大多数。皮尤在 2018 年和 2019 年进行的随机拨号调查显示，47% 的西班牙语裔称自己是天主教徒，低于 10 年前的 57%。

在美国的四个主要地区（东北部、中西部、南部、西部），基督教徒人数均有所下降，无宗教信仰者占成年人口的比例有所上升。天主教徒的流失在东北部最为明显，2009 年该地区有 36% 的成年人是天主教徒，而现在只有 27%。新教徒降幅最大的是南方，目前该地区新教徒占成年人口的 53%，低于 2009 年的 64%。

过去十年，自称是摩门教徒的人在美国人中所占比例稳定在 2%。与此同时，认同非基督教信仰的美国成年人的比例略有上升，从 2009 年的 5% 上升到今天的 7%。这包括 2% 的犹太教徒、1% 的穆斯林、1% 的佛教徒、1% 的印度教徒和 3% 有其他信仰的人。

过去十年，美国无宗教信仰的成年人数量增长了近 3000 万。如今，17% 的美国人表示他们从不参加宗教活动，每周至少参加一次宗教活动的美国人越来越少，所占比例由 2009 年的 37% 下降到 31%。尽管无宗教信仰者在年轻人和老年人都呈上升趋势，但在年轻人中增长最为明显。84% 的“沉默一代”（出生于 1928

年至 1945 年之间)和 76%的“婴儿潮一代”认为自己是基督徒，而“千禧一代”中只有 49%的人认为自己是基督徒，10%认同非基督教信仰，40%无宗教信仰。

在成年白人中，每年只参加几次或不到几次宗教仪式的人所占比例超过了每月参加一次或多次的人（57%比 42%）。在美国黑人中，经常去教堂的人数仍然超过不经常或从不去教堂的人数（58%对 41%）。与男性（30%）相比，认为自己没有宗教信仰的女性更少（23%），且每月至少参加一两次宗教活动的女性比男性更多（50%比 40%）。

大多数白人新教徒仍然称自己为“重生或福音派”基督徒。自称是重生或福音派新教徒的美国成年白人比例从 10 年前的 19%降至 16%。福音派白人占美国人口的比例越来越小，这既反映了美国人口结构的变化（白人占美国人口的比例正在下降），也反映了美国社会更广泛的宗教变化（认同基督教的成年人比例在下降）。

从党派来看，无宗教信仰者现在占民主党人的三分之一。约六成认同或倾向民主党的人表示，他们每年参加宗教仪式的次数不超过两位数。在共和党内部，无宗教者和不常去教堂的人也在增加，不过他们在共和党人中所占的比例低于在民主党中的比例。

本刊所载文章的观点不代表本刊编辑部观点，仅供读者参考。

编辑部：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社联大楼201室

邮编：200020

电话：021-33665148

工作邮箱：[bianjibu@sias.org.cn](mailto:bianjibu@sias.org.cn)